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上

吴趼人著

张友鹤校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八年·北京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 数 644,000 开 本 787×1092 毫 米 $\frac{1}{32}$ 印 张 29 插 页 4

1959 年 7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78 年 5 月 湖 北 第 1 次 印 刷

书 号 10019·1335

定 价 2.25 元

前 言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清末吳沃尧著，是一部著名的暴露封建专制制度末期政治和社会黑暗的小說。

这种暴露性的小說，在清朝末年义和团起义失敗之后，盛行一时；第一部是李宝嘉的《官場現形記》，接着就是这部《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两部代表作打开了道路，后来类似的作品，便风起云涌地出現。魯迅先生在《中国小說史略》里面，把这种小說叫做“譴責小說”。他指出：清王朝自嘉庆（一七九六——一八二〇）以来，虽然先后镇压了白蓮教、太平天国、捻軍和回民的起义，但在鴉片战争、英法联軍、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当中，却一次又一次地遭到可耻的失敗，暴露出这个腐朽的王朝完全没有能力保卫自己的国家。于是，“有識者則已翻然思改革，凭敌愾之心，呼維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頓有撻击之意矣。其在小說，則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糾彈，或更扩充，并及风俗。”（《中国小說史略》第二十八篇）

魯迅先生把譴責小說的盛行，看作是当时人民对清朝政府絕望后的鞭撻，这是非常正确的。清王朝对于资产阶级改良派所领导的戊戌变法运动，进行了血腥的镇压，这就表明它决心頑固

到底，对于温和的改良的要求也不能容忍。紧接着两年之后，清王朝又狡猾地利用了农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义和团起义，借以排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影响，而当帝国主义侵略联军打进来的时候，又无耻地出卖了起义的农民，在农民的血泊当中，实行所谓“宁赠友邦，不与家奴”，这就表明清王朝乃是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工具，为虎作伥的祸首。这样一来，中国人民面前便有了两份有力的反面教材，教导着一个革命的真理：清朝政府是“不足与图治”的，对付之道，只有“撙节”，干脆推翻它，消灭它。谴责小说便是作为“批判的武器”，出现在那样一个迫切要求着“武器的批判”的时候。

谴责小说里面，清王朝的整个统治机构及其统治下的整个上层社会，呈现出一片黑暗腐朽、肮脏丑恶的面貌。对于革命者和爱国者，对于一切想望未来相信未来的人们，他们可以借助于这种暴露，更清楚地认识敌人，增加对敌人的仇视、鄙视和蔑视，坚定胜利的信心。

可是，谴责小说也有严重的缺点。鲁迅先生从创作方法的角度尖锐地批判道：“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他批判《官场现形记》道：“然臆说颇多，难云实录，……况所搜罗，又仅‘话柄’，联缀此等，以成类书，官场伎俩，本小异大同，彙为长编，即千篇一律。”又批判《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道：“惜描写失之张皇，时或伤于溢恶，言违真实，则感人之力顿微，终不过连篇‘话柄’，仅足供闲散者谈笑之资而已。”

鲁迅先生所指摘的两点，一是不近情理、违反真实的过份夸张的描写，一是大量堆积、不加剪裁的千篇一律的题材，这些都

是創作方法上的缺点，是同作家們政治思想的錯誤相联系的。

譴責小說的作者們的政治思想，一般都屬於改良主义的范畴。改良主义的本質是反动的。中国的改良主义尤其帶有浓厚的封建性和买办性。戊戌变法运动以前，在当时的条件下，改良派的变法运动还有进步意义。义和团起义之后，条件变化了，中国革命向前发展了，改良派日益丧失了进步意义，反动的本質日益暴露出来。他們对封建制度有所不滿，但依恋仍深，对帝国主义有一些“敌愾之心”，但幻想亦多。他們最害怕的还是人民群众，对于資產阶级革命派所进行的推翻清朝統治、建立資產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斗争，始終反对。这样，他們就自陷于矛盾之中：在他們看来，现实生活是充滿了黑暗和丑恶的，但他們不知道，那丑恶和黑暗的根源正是他們恋恋不能舍去的东西；而唯一能够从根鏟除一切黑暗和丑恶的，是来自人民的革命力量，但他們对人民力量，却比对于任何黑暗和丑恶更为害怕。他們的作品應該是針對封建制度的“批判的武器”，可是他們反对在现实生活中使用“武器的批判”。这样，他們当然不可能把“批判的武器”使用得好，不可能把那些黑暗和丑恶的本質深刻地揭露出来。为了加强效果，他們只好求助于大量丑恶故事的罗列，求助于不近情理的夸張了。

所以，譴責小說对于革命的、爱国的、对未来抱有希望的讀者，固然可以有积极的作用，如前所述；可是，对于別一样的讀者，作用就很不相同。作者揭露了那样多的黑暗和丑恶，而对之莫可奈何，这就当然也可以引向妥协，正是所謂“仅足供閑散者談笑之資而已”。

二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写的是从一八八四年中法战争前后到一九〇四年前后这二十多年。中法战争后资产阶级改良派开始登上历史政治舞台。中日战争后改良派发动变法运动失败。一九〇五年中国革命同盟会成立。所以，本书所写的二十多年，恰好是一个段落，改良派在这段时间里，积极地进行改良的活动；同盟会成立以后，历史已是属于革命派的了。但本书实际写作时间，是在这二十多年的最末尾。那时，改良的希望早已破灭，新的革命高潮正在迅速到来，封建专制制度已经是命在旦夕，无药可医。作者在那样的时候，回顾总结二十多年的历史，心情是悲凉的。他声称：“不知此茫茫大地，何处方可容身，一阵的心如死灰，便生了个谢绝人世的念头。”（第一回）他把一切黑暗和丑恶的现象，统称为“怪现状”，表明他已经很难理解这个世界。结末赞语道：“悲欢离合廿年事，隆替兴亡一梦中。”更是无可奈何，只好视同空虚的一梦。

但实际上，二十年的历史当然不会是一场梦，而“怪现状”也无非是垂死的阶级和社会制度所产生的必然的现象。我们从大量堆积的“怪现状”当中，仍然可以相当清楚地看出二十多年历史的面影。

这二十多年历史的开端，已在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之后。书中没有写到太平天国革命，可是，第四十回吴继之、文述农和“九死一生”三人填词题《金陵图》，不约而同地都写得凄凉哀怨，说什么：“几代笙歌，十年鼙鼓，不堪回首叹靡零。”说什么：“最销魂红羊劫尽，但余一座孤城。”三人词中，充满了“台倾”“馆寂”

“鬼嘯”“燐青”“荊棘”“銅駝”等类的字样。这些虽然表现了統治階級对太平天国革命的仇恨和誣蔑，但也反映出伟大的农民起义对于統治階級的打击的沉重。尽管所謂“同治中兴”大吹大擂，但統治階級的人們只要一回顧这个曾經是太平天国革命首都的城市的历史，便不自禁其战栗和哀伤，哪里有真正的“中兴”的自信？

而况，太平天国革命尽管被鎮压下去了，农民起义的浪潮仍然不断地在冲击着封建統治的基础，資產階級革命派的活动更是給予封建統治以严重的打击。第八十回至八十一回写成都一个江湖术士的騙局，竟然震动了全省的官僚，弄得“到处风声鹤唳”；第五十八回至五十九回写广州传来一个万寿宮地下有人埋炸藥的謠言，把全城文武官員吓得神經錯乱，都可見統治者虛弱和恐惧到了怎样的程度。

一部分地主階級向資產階級轉化，对于封建統治，起着离心作用和瓦解作用。本書的一个特色，是鮮明地把“做官”和“經商”对立起来，写“官場”不是人干的，而“商場”尽管也有“怪现状”，还是比“官場”干淨。已入“官場”而坚决要出来的吳繼之，未入“官場”而坚决不願进去的“九死一生”，都有一条似乎很值得驕傲的道路可走；这道路不是《儒林外史》所指出的做隱士，也不是《紅樓夢》所指出的做和尚，而是去“經商”。这种商人，不是封建社会中一向为貴族官僚士大夫所鄙視、自己也很自卑的“市僧”，而是公然以“經商”的身分自豪，傲視做官，傲視科举，傲視一切假名士和濫文人，正在通过商业資本的途径向資產階級轉化的地主。这种社会力量，正是改良主义的基础，在我国封建社会的文学作品当中，还是第一次出現。

封建皇朝自己早已腐朽，受着农民起义和資產階級革命的

冲击，又有资产阶级化的地主对它起着离心和瓦解的作用，促使它更加腐朽，更加动摇。这样的政权，当然不可能有效地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第十四回写南洋海军整个系统内上下成风、朋比为奸、无孔不入的贪污，把战斗力腐蚀干净了。中法战争时，馥远号兵轮的管带，远远看见海上一只船，疑心是法国的兵船，逃走都怕来不及，自己开放水门将船沉下，大家乘了舢板逃命，而事后捏报“仓卒遇敌，致被击沉”云云。中法战争当中，清朝的南洋海军就是这样复没的。可是十年之后中日战争当中，清军在朝鲜平壤的失败，情形就更为可耻。第八十三回写叶军门在平壤被围，公然亲笔写信给日军方面，请求日军“退开一路，让我兵士走出，保全性命，情愿将平壤奉送”，这样地通敌乞怜、放弃守土之后，又“捏报了败仗情形，分电京津各处。此时到处沸沸扬扬，都传说平壤打了败仗，那里知道其中是这么一件事”呢！

贪污的毒菌，不仅腐蚀了国防力量，而且侵入了统治机构的每一毛孔。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统治者对金钱的无厌的追求。皇朝命在垂危，大小官员在朝不保夕的感觉中，除了抓紧每一个机会最大量地攫取金钱财货而外，什么也不关心。上自“老佛爷”（慈禧太后）、王爷、中堂、尚书、侍郎、总督、巡抚，下至未入流的佐杂小官，宫里的大小太监，官僚的幕客、家丁、差役、马弁、姨太太、小姐、丫环、僕妇，全都撕下了各种假面具，赤裸裸地当强盗、骗子、小偷，当乌龟王八、婬童娼妇，只要能够弄到钱，只要能够取得更高的地位去弄更多的钱。而这种追求金钱的大疯狂，归根到底，就是对人民的敲骨吸髓的榨取，就是国家主权、土地、资源的大拍卖。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寄生虫：善棍、赌棍、买办、讼师、江湖劣医、人口贩子、外国“冒险家”，……都是直接

間接依附侵略者統治者的，相互勾結，相互競爭，一起來吮吸人民的血汗。“九死一生”說：“我出來應世的二十年中，回頭想來，所遇見的只有三種東西：第一種是蛇蟲鼠蚊，第二種是豺狼虎豹，第三種是魑魅魍魎。”（第二回）指的就是這些現象。

魯迅先生引了“九死一生”的這句話，接着就說：“則通本所述，不離此類人物之言行可知也。”我們從魯迅先生的話，可以得到這樣的啟示：作者的眼里，只看到這些“怪現狀”，只看到這些蛇鼠、豺虎、魑魅之流為害人民，污濁社會，摧殘國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當時社會腐朽沒落的垂死面貌，但是看不見人民的力量。當時的人民，並非不聲不響、帖帖伏伏地听憑那些東西吸血，而是正以熊熊的怒火在燒除它們。那些東西的無恥和瘋狂，不是表現它們的強大，正是表現它們的垂死的掙扎。事實上，它們已臨到被澄清和掃蕩的時候。而作者竟看不見這一點，這就使作品沉溺於“怪現狀”的演述之中，而缺乏击中要害的批判力量。

三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所描寫的范围，較之《官場現形記》稍廣，但還是以官場的怪現狀為中心綫索，其次則涉及於商場和“洋場”。商場和“洋場”的勢力，有時竟能左右官場，書中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反映。例如第七十五回開始出現的北京一個錢舖掌櫃憚洞仙，就是一個相當有神秘性的握有潛勢力的人物，周中堂、奕劻、慶邸都由他經手，實際上周中堂往往受着他的支配，這就反映出當時中國社會“資本”逐漸控制“政治”的現象的萌芽。而作者並沒有意識到這種演變的本質意義，所以還只是對於小異大

同、千篇一律的官場伎倆，給以正面和反面的總結。書中曾有正面的總結是，“九死一生”對母親說：“這個官竟然不是人做的。頭一件先要學會了卑污苟賤，才可以求得着差使。又要將良心攔過一邊，放出那殺人不見血的手段，才弄得着錢。”（第五十一回）反面的總結是，卜士仁告誡他的侄孫卜通道：“至于官，是拿錢捐來的，錢多官就大點，錢少官就小點；你要做大官小官，只要問你的錢有多少。至于說是做官的規矩，那不過是叩頭、請安、站班，却都要歷練出來的，任你在家學得怎么純熟，初出去的時候，總有點躡手躡腳的；等歷練得多了，自然純熟了。這是外面的話。至于骨子裏頭，第一個秘訣是要巴結；只要人家巴結不到的，你巴結得到；人家做不出的，你做得出。……你不要說做這些事難為情，你須知他也有上司，他巴結起上司來，也是和你巴結他一般的，沒甚難為情。……你千萬記着‘不怕難為情’五個字的秘訣，做官是一定得法的。如果心中存了‘難為情’三個字，那是非但不能做官，連官場的气味也聞不得一聞的了。”（第九十九回）全書所記“怪現狀”，粗略計算，約一百八十九件，看了這兩段總結，的確可以得其精要了。

書中有一個描寫得比較多的、大致與全書相終始的反面人物，可以說是譴責小說塑造完整典型的某種嘗試，這就是那個十足衣冠禽獸的苟才。

這個苟才，在南京當候補道，為人愛擺架子，要排場，善于應酬。家庭生活是一場糊塗。對於應酬場中好似交情不壞的朋友，能利用時盡量利用，不能利用時一反手便是陰謀陷害。他鑽營得來的一个差使，被彈劾撤掉了，向欽差行了几万兩銀子的賄賂，仍然保全了功名。為了鑽謀再得差使，他便干下了一件卑鄙絕倫的事：打听得總督最得寵的五姨太太剛剛死去，于是兩夫妻

硬逼着自家一个寡媳，把她送给总督去补五姨太太的缺。

他们这个儿媳，才十五岁，嫁到他们家才几个月。新婚三朝之后，便受到苟才夫妻的百般凌虐。不久丈夫死了，更是过着地狱似的生活。一天中午，一对狗夫妻突然在儿媳面前双双跪下，苟才甚至行了见皇帝和元日祭祖时才行的大礼，哀求她“屈节顺从”，去做总督的姨太太。儿媳痛哭坚拒，苟才的妻妹又出来劝诱，一对狗夫妻又一再催逼，逼得儿媳无路可走，最后，走到丈夫神主面前——

一口气便哭了两个时辰。哭得伤心过度了，忽然晕厥过去。……救了过来。一醒了，便一咕噜爬起来坐着，叫声：“姨妈！我此刻不伤心了。甚么三贞九烈，都是哄人的说话；甚么断鼻割耳，都是古人的呆气！唱一出戏出来，也要听戏的人懂得，那唱戏的才有精神，有意思；戏台下坐了一班又瞎又聋的，他还尽着在台上拚命的唱，不是个呆子么！叫他们预备香蜡，我要脱孝了。几时叫我进去，叫他们快快回我。”苟才此时还在房外等候消息，听了这话，连忙走近门口垂手道：“宪太太再将息两天，等把哭的嗓子养好了，就好进去。”

——第八十九回

此后苟才果然扶摇直上，甚至署理了几天藩台。不料他那个靠山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新任两江总督也觉得苟才这样的行为过于有伤统治阶级的体面，用了“行止龌龊，无耻之尤”的八个字考语，把他参掉了。苟才还“气的直跳起来”。

苟才又跑到天津，去找原任两江现任直隶总督，替他设法开复了功名，又用了巨额贿赂走了华中堂的門路，然后带着中堂、总督的两封介绍信到安徽鑽营活动。他在安徽非常得意，当了两年银元局的总办，搜括贪污所得的钱之多，竟至于使他不再想升官，只要能够把这个差使多当几年，便心满意足。可是第三年来了一个清理九省财赋的钦差，将苟才撤差查办，结果是苟才化

了六十万两銀子，仍然將功名保住。“化的六十万虽多，幸得他还不在乎此。每每自己寬慰道：‘我只当代他白当了三个月差使罢了。’”（第九十五回）

以后苟才还在安徽搜括了几年，“宦囊盈滿”到了“不在乎差使”的程度，才跑到上海做寓公，求名医医治他的怔忡之症。他的第二个兒子苟龙光，同他的第六个姨太太有曖昧关系，又嫌父亲不能痛快地給錢給他用，便串通了一个江湖劣医，在用药上要花样，断送了老苟才的命。

这个苟才的行止醜態，无耻之尤，不必說了。值得注意的是，安徽当时是个“劣省份”（第九十四回安徽华巡撫語），一个銀元局总办，平均每月貪污所得就是二十万两銀子，这个駭人听闻的数字，表明人民所受的剝削重到什么程度。清末由两江总督調任直隶总督的，大抵是皇朝最为倚重的“国家柱石”，而苟才就是送兒媳給“国家柱石”做姨太太因而得到他的提拔和支持的。苟才遇到两次欽差查办，都以巨額賄賂，得以平安无事，而欽差大臣正是封建統治最高权力皇帝的代表人。由此可見，这个衣冠禽兽并不是什么特殊的怪物，而正是当时整个封建統治制度所培养所庇护的。

苟才的禽兽似的行为，表明了瀕临死亡的封建統治階級的道德敗坏，精神墮落，家庭崩解。苟龙光的行为，完全是步趋苟才的榜样，可謂“乃父之肖子”。苟才的兒媳行前的一番話：看戏的既是又聋又瞎，做戏的又做給誰看？說明了破坏封建道德的，首先就是封建統治階級自己。这个不幸的少妇的遭遇，是对于垂死的封建制度迫害妇女、蹂躪人权的无边的罪恶的控訴。

除了苟才而外，本書还比較集中地写了另一个反面人物——“九死一生”的伯父子仁，純用“側筆”，鈎画出一个同苟才

相差无几的形象，特別突出他对家庭骨肉的凉薄无情，对孤侄寡姊的侵吞詐騙。实际上，这不过就是金錢的势力撕下了家族关系上面温情脉脉的紗幕之后，社会上大量存在的現象。

本書所写大量的反面人物的对面，还有一个作者当作正面人物来写的集团；以吳繼之为中心，圍繞在他周围的，首先就是他的忠实追随者和得力助手“九死一生”，他的主要干部文述农、管德泉、金子安，以“賢良方正”姿态出現的蔡侶笙，以“賢妻”姿态出現的吳繼之夫人和蔡侶笙夫人，以“良母”姿态出現的吳繼之的母亲和“九死一生”的母亲，还有被写成德才学識兼备的、最理想的青年女子的形象的“九死一生”的堂姊，等等。这个正面人物的集团，艺术結構上是貫串全書的綫索，思想意义上則是一切“怪現狀”的批判者。可是，日益失去进步意义的改良主义政治思想的指导之下，并不能够創造出真正鮮明有力的正面形象来。

吳繼之出身于“本省数一数二的富戶”（第二十回尤云岫語），中进士后，在南京以知县候补，“官运”很不錯，据說是由于江宁藩台同他是世交，主动照顧他的。但藩台母亲做寿，他还是专派“九死一生”去上海办壽礼，挖空心思迎合老太太。这位藩台“官运”也很不坏，很快就調升为安徽巡撫。而吳繼之一面做官，一面就将“宦囊所入”和家中所收田租，集成資本，經营商业；脱离官場以后，完全轉入商場。上海設总店，北京、天津、汉口、九江、蕪湖、鎮江、南京、苏州、杭州、广州等处遍設分店，各处管事都用吳家本族的人，大規模地收購各地土产，販到天津、牛庄、广州等地去发卖，看起来多半是把原料卖到外国去。最后生意垮台，成为地主階級向資产階級轉化的道路上一个失敗者。

这个亦官亦商、由官而商的吳繼之，在官場中照样地貪污，

理論是：“你說誰是見了錢不要的？……历来相沿如此，我何犯着把他叫穿了，叫后来接手的人埋怨我？只要不另外再想出新法子来舞弊，就算是个好人了。”（第十四回）他認為世界的本質是丑惡的，全靠騙局来維持；对付之道，在于知其騙而不揭破之，实际上大家一起为惡，同时又大家互相欺騙；人生的意义就是“在世界上混”，做人的要义就是“不要討人嫌”。（第八十六回）这种腐臭的市儈哲学，教人同流合污，推波助瀾，照样干坏事，还自以为有資格笑罵別人。

吳繼之的市儈哲学，是以他为中心的那个集团中許多人的指导思想。“九死一生”的堂姊告誡“九死一生”道：“据我看繼之待你，那給你館地、招呼你一层，不过是朋友交情上应有之义；倒是他那随时随事教誨你，无论文字的紕繆，处世的机宜，知无不言，这一层倒是不可求的殊恩，不可不报的。”（第四十二回）“九死一生”果然恪遵这个教訓，忠誠地为吳繼之服务，做他的幕客，做他的經理，做他的私人秘書，做他的偵探，甚至扮作他的家人，跟他进考場，代他閱卷。書中写这些服务，都写得揚揚得意，似乎是十分光彩的事情。

“九死一生”在吳繼之一手教导和培养之下成长起来，終于成了怎样的一个人呢？把第八十五回所写的他初次到妓女林慧卿家，同林慧卿油腔滑調地开玩笑那个片段，同第一百零八回所写的他到宜昌去奔伯父的喪，伯母一班人怀疑他来爭遺產，他橫眉斜眼地对付她們那个片段，合起来一看，我們就看到一付“才子+流氓”的形象。

吳繼之和“九死一生”，是本書当作正面人物来写的最主要的两个，至于其他几个，更不必說了。

作者写不出真正的正面人物，因此，对于当时中国所遭遇到

的各种問題，也就不可能提出正确的答案。怎样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呢？書中正面人物之一王伯述說，只要上下齐心协力，認真办事，节省虛糜，認真建設国防就行。（第二十二回）多么微弱的声音！第六十七回写一个帝国主义分子，第八十一回写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駐重庆的領事，还把他們写成支持中国人民反抗官吏的压迫，为中国人民請命的样子，可見幻想还是多么大！怎样推翻封建主义的統治呢？“九死一生”对于大地主土地所有制很贊美，認為吳繼之之所以能身在官場而独不卑污苟賤，就因为他家里收的田租多，永远得不到差使也有的是錢用，用不着卑污苟賤地去弄錢。（第五十一回）王伯述認為，改造政治要从改造讀書人着手，改造讀書人的方案只是請政府設立各种講求“实学”的专门学校，以及宣传推广种种講“新学”的書，有“实学”知“新学”的讀書人将来出来做官，政治就会好起来。这里面，連对于封建专制制度的某些温和的修正都沒有提到。

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是当时中国两个最基本的問題，書中都提不出任何正确的解决方案。妇女問題，家庭制度問題等等，作者都自以为提出了解决的方案，并且儼然自命是进步的方案；而实际上，什么也沒有解决，其中有不少方案根本就是有利于反动方面的。这种情况，作者当然也不会完全不意識到，所以到底还是沒有出路，只好以“交代明白，翻身就走，一直走到深山穷谷之中，絕无人烟之地，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去了”（第一回）了之。

可是，交代并未明白，翻身就走也走不掉，我們随后发现作者并不是在什么“深山穷谷之中，絕无人烟之地”，而仍然是在“十里洋場”的上海，还写了許多小說。《上海游驂录》写于本書之后不过几年，在那里，作者就是以资产階級革命派为攻击的对象。

作者在那部小說的跋文里說道：

今日之社會，岌岌可危，固非急圖恢復我固有之道德，不足以維持之；非徒言輸入文明，即可以改良革新者也。意見所及，因以小說一途暢言之。

那是辛亥革命的前夕，改良主義者看到了封建制度的“岌岌可危”，覺得它的“怪現狀”已經是无關重要的事，最重要的是挽救它的危亡；於是拋下譴責之筆，拋下“輸入之文明”，而要用“固有之道德”來撻伐那些不“道德”的革命黨人了。

四

一本書作者吳沃尧，字小允，又字菑人，後來改字趼人。他是廣東南海縣人，因為住在佛山鎮，所以別號我佛山人。三十幾歲時到上海，常為報紙撰寫小品文字。戊戌政變後，梁啟超在日本創刊《新小說》，他才應約開始寫長篇小說，先後發表《痛史》、《九命奇冤》、《電術奇談》和這部《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他去过日本，為時不久。他曾任漢口《楚報》的主筆，該報是美國人辦的，一九〇四年反對美帝國主義的“華工禁約”問題發生，他聞訊憤然辭職，參加了這個愛國運動。他在上海，為《綉象小說》寫《瞎騙奇聞》。李寶嘉寫《活地獄》未成而死，他為之續寫。一九〇六年和周桂笙等創辦《月月小說》，自任主筆，發表《劫餘灰》、《發財秘訣》、《上海游騷錄》。一九〇七年，主持廣志小學，因為全力辦學校，這一時期作品不多。一九〇七年，作《近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又名《最近社會醜態史》），發表於《時務報》。一九一〇年九月，以痰喘病卒於上海，年四十五歲（一八六六——一九一〇）。他一生所作小說，據統計，達三十種以上。

本書是張友鶴同志根据广智书局“第一次排印本”校点整理的。这个本子和通行本略有歧异之处。它也有显然的錯誤，如第二回“另外叫个什么死里逃生呢”，“死里逃生”应作“九死一生”。第十八回“他的这位叔父”，“他”应作“我”。第四十八回“覬覦”应作“覬覦”。这些以及类似这些的地方，都已据語义文理改正。

書中有些关于当时社会制度、官場術語以及个别不为今天一般讀者所知的典章、文物和語言，整理者分別在各回之末加了一些注釋。

簡 夷 之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